

清代甘肃进士研究

QINGDAI GANSU
JINSHI YANJIU

陈尚敏 / 著

甘肃作为地处西北的边地省份,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清代甘肃共产生进士332名,主要分布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交通便利的府州,比如兰州、巩昌、凉州等。除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外,地理交通社会习俗和学风、学风等也是影响进士分布的重要因素。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代甘肃进士研究 / 陈尚敏著.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226-04433-9

I. ①清… II. ①陈… III. ①进士—人物研究—甘肃省—清代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5931 号

责任编辑: 张 菁

装帧设计: 马吉庆

清代甘肃进士研究

陈尚敏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216 千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ISBN 978-7-226-04433-9 定价: 28.00 元

► 前 言

003 / 一 学术史回顾

008 / 二 两种科举文献说明

013 / 三 其他

► 第一章 清代甘肃进士的时间分布

019 / 一 清代甘肃进士的时间分布

025 / 二 晚清陕甘分闱

► 第二章 清代甘肃进士的地理分布

041 / 一 清代甘肃进士区域分布的基本状况

045 / 二 秦州拥有较多进士人数及其成因

050 / 三 凉州科举家族出现及其成因

062 / 四 清代甘肃进士总数居各行省之末

► 第三章 清代甘肃进士的教育养成

069 / 一 书院教育

077 / 二 游学他乡

081 / 三 地方官培植

083 / 四 家族因素

088 / 五 社会助考

► 第四章 清代甘肃进士的仕宦

101 / 一 清代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概述

105 / 二 清代甘肃进士任职的基本情况

112 / 三 清代甘肃进士的初仕

127 / 四 清代甘肃进士的迁转

135 / 五 余论

► 第五章 清代甘肃进士与地方社会

143 / 一 从事地方教育

151 / 二 编纂地方志

157 / 三 维护地方治安

163 / 四 余论

► 第六章 清季民国的甘肃进士

171 / 一 思想变动

179 / 二 参与地方新政

189 / 三 易代之际

194 / 四 社会流动

► 第七章 刘尔炘研究

204 / 一 刘尔炘生平与著述

207 / 二 刘尔炘儒学思想

219 / 三 刘尔炘与民国九年甘肃震灾救济

► 征引文献

233 / 基本史料

242 / 著作

246 / 论文

► 附录

253 / 附表1 清代甘肃进士基本信息表

267 / 附表2 清代甘肃府县进士统计表

272 / 后记

前

言



进士为科举的终端,常被喻为蟾宫折桂。从其社会流动来看,他们有着多重身份,就一般而言大都能进入体制,出仕为宦;退职后回归故里,以士绅的身份参与地方社会建设;一生不失“士”的身份,亦即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传播。自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开启了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民国鼎革,他们的思想和社会流动都发生了新的变动。本著以清代甘肃进士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他们的时空分布、教育养成、仕宦、参与地方社会建设以及在近代社会转型背景下,其价值取向和社会流动发生变化等方面进行论述,有助于了解清代甘肃的科举教育、社会结构以及近代转型诸问题。

一 学术史回顾

进士作为科举制度下形成的一个人才群体,有关它的研究总是伴随着人们对科举的认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废止,当时主要是基于科举的存在阻碍了新学教育的发展。但科举具有多种功能,为传统政治选拔合适的管理者是其根本。民国鼎革,文官制度迟迟不能建立起来,革命者如孙中山就说过“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法,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中国乞丐之子,凭考试取功名,实平等已极。此外人深以为然,奈何我国人不自

知耶?故甚望保存此良法,而勿忘记中国自己之良法也”^①。曾是趋新的梁启超也发出感叹:“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不足致用耳”,“此法之造于吾国也大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②。这些声音都可视为要求重新反思科举的表现。作为科举制产生的进士也进入到学者的视野,像张耀翔《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一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文章认为科举是最公平的竞争方式,因此进士地理分布研究对考察人才聚集地及其走势具有一定的客观价值^③。他的《中国人才产生地》也是以清代进士地理分布为研究对象的^④。两文在研究内容和方法取径上大致类近。稍后有黄炎培《清代各省人文统计之一斑》一文,较为称著^⑤。30年代还出现了两本研究科举的专著,即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和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两书的作者未用“科举”,而是用了一个较为中性的“考试”,这里也可见出时人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尚存有一定的顾虑。

科举的研究后来有过一段沉寂。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科举研究空前地活跃起来。刘海峰教授在1992年首次提出建立“科举学”^⑥的倡议,并对科举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目的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什么是科举学?顾名思义,科举学就是研究科举的学科或学问”^⑦。“凡是对科举本身及直接与相关的问题所做的研究,都属于‘科举学’”^⑧。它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

①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第529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第68页。

③张耀翔:《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心理》第4卷第1号,1926年。

④张耀翔:《中国人才产生地》,《晨报副刊》第1480-1481号,1926年。

⑤黄炎培:《清代各省人文统计之一斑》,《人文月刊》第2卷第6期,1931年。

⑥刘海峰:《“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⑦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⑧刘海峰:《“科举学”:求解科举研究的最大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年第3期。

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类近于当今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等。只不过红学以一人名学、敦煌学以一地名学、甲骨学以一物名学,而“科举学”则以一种制度为学。

建立科举学的倡导,推动了有关进士的研究。像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文章通过对明清进士与人才在时空分布上的相互关系,认为明清人才最多的城市几乎都是科举发达的城市,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①;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认为清代进士人数的增减,随王朝的科举政策而变化,也明显受时局影响,其地域分布呈现持续不平衡状态^②。从区域视角出发,着眼于省区范围内研究进士分布也是其中的亮点^③。

李润强《清代进士职官迁转研究》一文认为,清代科举考试,形成了完整、严密的考选制度。清代进士从入仕到迁转的整个经历,说明了仕历的优越性。一般说来,进士初仕,与其会试复试、殿试和朝考的等第有密切关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专向性,但其后迁转的迟速却取决于其他因素,主要受满汉复职制和异途捐纳等外部影响^④。以清代进士仕宦为论题,此类研究无多,该文为笔者所仅见。

①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②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③[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见缪进鸿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国生等:《清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王耀生:《明清时期山东进士地域分布特点及与经济、区位、民风的关系》,《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9期。清代文教政策和科举制度基本承袭明代而来,因此论者多将明清两代作为一个共同的时间单位。

④李润强:《清代进士职官迁转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李润强《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是对清代进士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著从清代进士产生的历史环境、清代进士分布与仕宦、清代进士与科场文字案狱、清代进士与康乾学术思想、清代进士与教育文化等五个部分进行论述。该著的学术意义还在于,提示着进士研究尚有广阔的领域。

关于清代甘肃进士的研究,张宾《甘肃明清进士翰林传略》,2005年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该著属史料整理性质,它为甘肃进士研究做了基础性的工作。曲剧《晚清甘肃进士研究》为2006年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张晓东《明清时期甘肃进士地理分布研究》为2007年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两文都对清代甘肃进士的时空分布及其成因作了可贵探索。曲剧的论文还涉及对晚清甘肃进士为官、为绅方面的事功研究,尤其可贵的是,她在对清代甘肃进士数量的考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就这一问题,还发表有专题论文^①。

对于清代甘肃进士的数量存在着几种说法,大都是依据一种文献来确定。曲剧先生使用现在能见到的登载清代甘肃进士信息的权威文献,像朱保炯、谢沛霖主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宣统《甘肃新通志》、《陕甘历科进士录》等,相互参稽,最后确定清代甘肃进士的数量为343人,这一数字是可信的,为本著所采用。地方志对本地科名的记载几乎是细大不捐,比实际中举及第人数只会多不会少。像宣统《甘肃新通志》将恩赐进士与祖籍在甘肃但户籍并不在甘肃者都视为甘肃进士,这显然是错误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一书,对明清全国进士的籍贯进行了逐一确认,成为此后研究者统计明清进士地域分布的重要依据,但它在编制上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同名地区的资料就无法区分。因此,多种文献相互印证,才能得出一个可信的结论。

^①曲剧:《清代甘肃进士人数考》,《陇东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田树榘和祁荫杰两位是否为进士，曲先生只是依据相关资料进行了一个合理的推断。但通过对其他一些文献的检索，就可以断定二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进士。如《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575，光绪三十三年六月癸未：“验看历科贡士，得旨：谢霈、杨原懋、祁荫杰着以主事分部学习。”《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591，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丙戌谕内阁：“此次验看之游学毕业贡士田树榘，着给予进士出身。”《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593，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庚午：“考列优等之进士程宗伊、田树榘，均着以主事分部补用。”上引材料，明确了两人的功名。祁荫杰为贡士，田树榘初为贡士，后因游学而“着给予进士出身”。

田树榘和祁荫杰两人均见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补行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恩、正并科《甘肃乡试同年齿录》，说明二人是光绪二十八年乡试中式成举人的。会试的参加者是举人，其中式叫贡士。二人均为贡士，说明他们都参加了光绪三十年（1904 年）甲辰科会试，并且都中式。贡士还需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之后便公布甲第、名次。一甲三名进士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向称三鼎甲；二甲进士称进士出身；三甲进士称同进士出身。经过殿试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进士，因此，未参加殿试者不能称进士是显然的。

清廷规定，会试之后，因故未参加殿试者是可以下一科进行补试的。通渭牛瑗，“光绪乙酉举于乡，庚寅会试既报捷，因臂痛请假，壬辰科补殿试”^①。可见，牛瑗光绪十六年（1890 年）庚寅恩科会试中式，因臂痛未能参加当科殿试，在光绪十八年（1892 年）壬辰科补行殿试之后才成为进士。镇番的张奋翼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丁未科进士。“丁未补殿试”^②是言其为前科会试中式，因故未能参加当科殿试，

①任承允：《桐自生斋诗文集》卷 6《四川候补知府牛君幼樵墓表》。

②王权：《笠云山房诗文集》卷 10《敕授文林郎四川筠连县知县龛南张君墓表》。

是在丁未科补试后成进士的。秦州张庆麟,“咸丰庚申成进士,壬戌补殿试”^①。其实他是参加了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科会试,中式为贡士,因故未能参加当科殿试,说他是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进士,是补试的结果。

可以断定的是,田树桢和祁荫杰两人都未参加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的殿试,至于何故,这就不得而知。第二年,科举废止了,他们就永远失去了成为进士的机会。因殿试不再黜落,故有会试中式即进士的观点,像有关祁荫杰的材料,就直接称其为进士。“祁荫杰,字少云,陇西县人”,“清光绪庚、辛并科举人,甲辰成进士,官礼部主事”^②。“先生字少潭,号漓云,清光绪甲辰进士。”^③严格来讲这是不对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陕甘总督升允派遣甘籍士人6名到日本留学,田树桢列名其中,这是甘肃国外留学之始^④。科举废止意味着学仕合一路径的断裂,清廷深知这种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利益调整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因而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其中就包括鼓励士人游学他国,学有所成者即奖以功名,其目的就在于使他们能够进入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以示上升的路径依然存在。田树桢为游学进士,可见,他就是这一政策的受惠者。

二 两种科举文献说明

本著所使用的资料,大都为人所熟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今甘肃省图书馆藏的两种清代地方科举文献,即甘肃士人刊刻的硃卷和甘肃乡试同年齿录。所谓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历

①王权:《笠云山房诗文集》卷8《敕授文林郎晓峰张君墓表》。

②《祁少云传略》,见王濬源主编:《王烜诗文集》(下册)。

③罗锦堂:《漓云诗存跋》,见祁荫杰:《漓云诗存》。

④朱允明:《甘肃解放前四十年教育史料》。

史的文献。

1. 乡试、会试及选贡硃卷

清代乡、会试后,为了防止考官因认识考生字迹而作弊,遂将举子用墨笔作答的试卷弥封,交誊录生用硃笔重新抄写,然后再交考官评阅。应该说,誊录生用硃笔誊写的卷子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硃卷”。这里所说的“硃卷”,是指新科举人、进士刊刻的自己当科试卷,旨在分送亲友及地方官,以扩大自身的知名度。虽系墨印,亦以“硃卷”称之。商衍鎤说:“新科举人进士自刊其闈艺分送亲友者,谓之乡试会试硃卷。因闈中誊录用硃,卷为主考所阅取中,是即闈卷之意,虽以硃卷称之,实为墨印而非硃耳。”^①

随着举人、进士自刊其闈艺的盛行,拔贡、优贡和副贡也参与其中,因而就有了选贡硃卷。在清代科举人才结构中,除举人、进士外,还有一个重要群体——五贡。五贡包括拔贡、优贡、副贡、恩贡和岁贡,其地位高于生员而低于举人。拔贡,清初每六年选拔地方儒学中优秀生员入国子监肄业。自乾隆七年(1742年)始,改为十二年一次,每逢酉年举行。考试时间在科考之后,学政随棚录取。优贡亦从地方儒学生员中选拔,各省学政三年任满,根据府、州、县学官上报,会同总督、巡抚选取文行俱优者,由学政考定保送。各省乡试因名额限制,一些文理优长的考生不能在正榜中录取,而是以副榜出之,是为副贡,即乡试副榜。上述三类贡生其名额按大、中、小省分配,名额很少。在地方儒学中,廪生食饩十年后挨次升贡,叫岁贡。府学每年一贡,州学三年二贡,县学两年一贡。如遇国家庆典,可依资历在廪生中再行升贡者为恩贡,亦即朝廷恩赏的贡生。上述可见,五贡当中,岁贡和恩贡是论资历而非考选,因此这两类贡生就不会有硃卷刊刻。

硃卷一般由履历、科份页和考生的文章三部分组成。履历包括考

^①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87页。

生本人履历、家族谱系和师承关系。考生履历记录考生姓名、字号、行第、生年、籍贯、户籍、住址、功名等。家族谱系包括考生的亲属源流，分上下两格，上格登直系始祖及高、曾、祖、父以上祖妣至本人父母；下格登同族尊长直到本人兄弟子侄、孙、侄孙及妻子姓氏与子女，凡有功名、官阶、封典、著述者，均在其名下附载。母系及妻子的父祖兄弟若有功名为官者，也附注于其姓氏之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硃卷所载家族谱系详于本支，旁支一般限在五服亲族。五服之说源于先秦的丧服制度，古人认为同姓亲族，以自己为本位，上推至四世高祖，下推至四世玄孙，皆为五代；旁及亲，则横推至三从兄弟，即族兄弟、堂兄弟、兄弟，同为高祖四世之孙，亦为五代。师承关系指考生的学业源流，一般分受业师和受知师两种。“亲受指示讲读者为受业师，入学及中举、中进士、复试、殿试、朝考阅卷者为受知师”^①。科份页包括考生本科科份、中式名次、考官姓氏官阶以及该房原荐批语。考生的文章包括考题和答卷，文章多刊刻首场三篇《四书》文和一首五言八韵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诏废八股，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首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程式”^②。从甘肃省图书馆藏的乡、会试硃卷来看，光绪二十七年以后诸科，文章多收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两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一篇、《四书》义或《五经》义一篇。

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阅览室”现藏乡试硃卷 57 份；会试硃卷 21 份；选贡硃卷 39 份。

2. 乡试同年齿录

“乡试同年齿录”是指同科举人按年龄长幼编纂的名录，一般系

①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 87 页。

②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 27。

由该科举人负责编纂刊印。记录的内容依次为考官姓名、官衔；考试题目，包括第一场的八股文、第二场的五经文、第三场的策题；同科举人的姓名，以年龄长幼为序；最后为该科举人的履历，记录的内容与殊卷的相关部分类近。

这里有必要区别“同年齿录”和“同年录”两种科举名录的异同。查现今出版的一些工具书，对它们的解释未作明确区分。“同年录，科举制度中，乡试、会试同科录取者称同年。宋有《绍兴同年小录》，载同年之籍贯、姓名、录取名次。同年录有按科场名次排列与按年龄排列二种，后者亦称‘同年齿录’。”^①“同年录，科举考试同科考中者互称同年，将其姓名、年龄、籍贯等编为一册，称为同年录。清代乡试、会试发榜以后，都要刊印同年录，以考中名次为序，始于宋代《绍兴同年小录》。又有以年龄为序者，称同年齿录。”^②“同年录”按考试名次排列；“同年齿录”按考生年龄长幼排列；但更大的不同点在于，“同年录”没有考生履历部分，内容相对简单。

科举时代，同年向有兄弟之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汉人称同举孝廉为同岁生，至唐乃有同年之目，其遇合皆适然事。然分谊之亲，虽兄弟不啻焉。”^③“同年齿录”的刊刻，其目的就在于同年间的联谊和社会交往。左宗棠就说：“近来习俗最重同年，其实皆藉以广结纳耳。”^④同年间的交往往常延至数代，衍生出名目繁多的社会关系。“本人对于同年之父，唐代称为同年丈人，后则称为年伯，祖父称太年伯，自称年侄、年再侄，同年之伯叔称年世伯、年世叔。同年之子若孙，互相称其父、祖父之同年亦曰年伯、太年伯，自称亦曰年侄、年再侄，称

①孟庆远主编：《新编中国文史词典》，第320页。

②许嘉璐主编：《中国古代礼俗辞典》，第822页。

③《重刻己酉同年齿录序》，见姚文田：《邃雅堂文集续编》。

④《与孝威》，见《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54页。

谓之可记者,大约如此。”^①

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阅览室”现藏的“乡试同年齿录”有同治十二年(1873年)癸酉科;光绪八年(1882年)壬午科;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科;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补行辛丑(1901年)、壬寅(1902年)恩、正并科。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陕甘在光绪元年(1875年)始分闱,因此同治十二年癸酉科的“乡试同年齿录”为陕甘两省乡试中式者的名录,共计118名,其中甘肃籍者为49名。清代科举实行分省取士政策,各省乡试中额在清代前期屡有变化,陕甘乡试中额自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定为62名后,一直保持到光绪元年分闱时未有变动。陕甘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恩科、三年甲子科、六年丁卯科乡试因受回民起义影响,未能如期举行,自同治十二年癸酉科始,将缺考的科次进行带补,因此,此科乡试中额较多。陕甘分闱后,甘肃乡试中额为40名^②,副榜6名。这样,甘肃省图书馆藏的“乡试同年齿录”实际上包含了甘肃200多名举人的履历情况。

硃卷和同年齿录对本著而言,其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其考生履历部分。潘光旦说:“硃卷必具履历;履历的一大部分是先世本支和旁支的一个题名,等于一本简略的家谱。”^③顾廷龙先生也认为清代硃卷是“不可多得的传记资料”^④。同年齿录也有考生履历部分,与硃卷相关部分类近。家谱是研究地方史的重要资料,但因甘肃“地处边陲,屡经兵燹,私家牒谱荡然无存”^⑤。因此,这两种科举文献的史料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硃卷和乡试同年齿录的家族谱系,清晰地勾勒了一个

①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89页。

②甘肃乡试中额40名,不包括专为宁夏、凉州满营所设的2名旗额。

③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142页。

④顾廷龙:《序》,见《清代硃卷集成》(第1册)。

⑤《陇右民族录序》,见张维:《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70页。

家族的外貌,其不足在于缺乏家族内部深细的描述,尚需和其他地方史料结合使用。

三 其他

康熙六年(1667年),陕西分省,析为陕西、甘肃。清代甘肃行省的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全境、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部 and 青海省东部地区。本著所谓的甘肃进士即是在上述区域所产生的进士。

史学研究引入区域概念,实际上是对空间因素的重视。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迥异。一味重视宏观的叙述往往遮蔽了相关史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从寻找普遍性到探讨地方性和特殊性,本身就是史学认识路线的辩证和深化的自然进程。另一方面,区域史的研究离不开对整体的关照,比如制度、政策、时代背景等,对任何区域都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具体到本著而言,一方面要挖掘区域性因素,体现出“甘肃”的特点,同时也要重视对制度、政策、时代背景等整体因素的关照,体现出“清代”的特点。总之,区域研究要为整体研究提供丰富的、具有独特内涵的个案,为深化整体研究有所助益。因此,发掘区域学术资源,也是当下学界的一个趋势。

缘于甘肃所处的区位及其民族构成,既存的甘肃区域史研究多在边疆史、民族史领域,教育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相对要薄弱得多。另外,就既存进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方面,尚有着待开拓的地方。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人物的研究在学理上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发现,一方面是受制于学者自身的学术关怀和学术兴趣,另一方面也与学者自身拥有的相关资料有关。虽然史学不等于史料学,但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无人质疑,言必称史料,几乎是治史者的本能反应。本著所涉及的论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史料来决定的。如果有新的史料发现,自然会